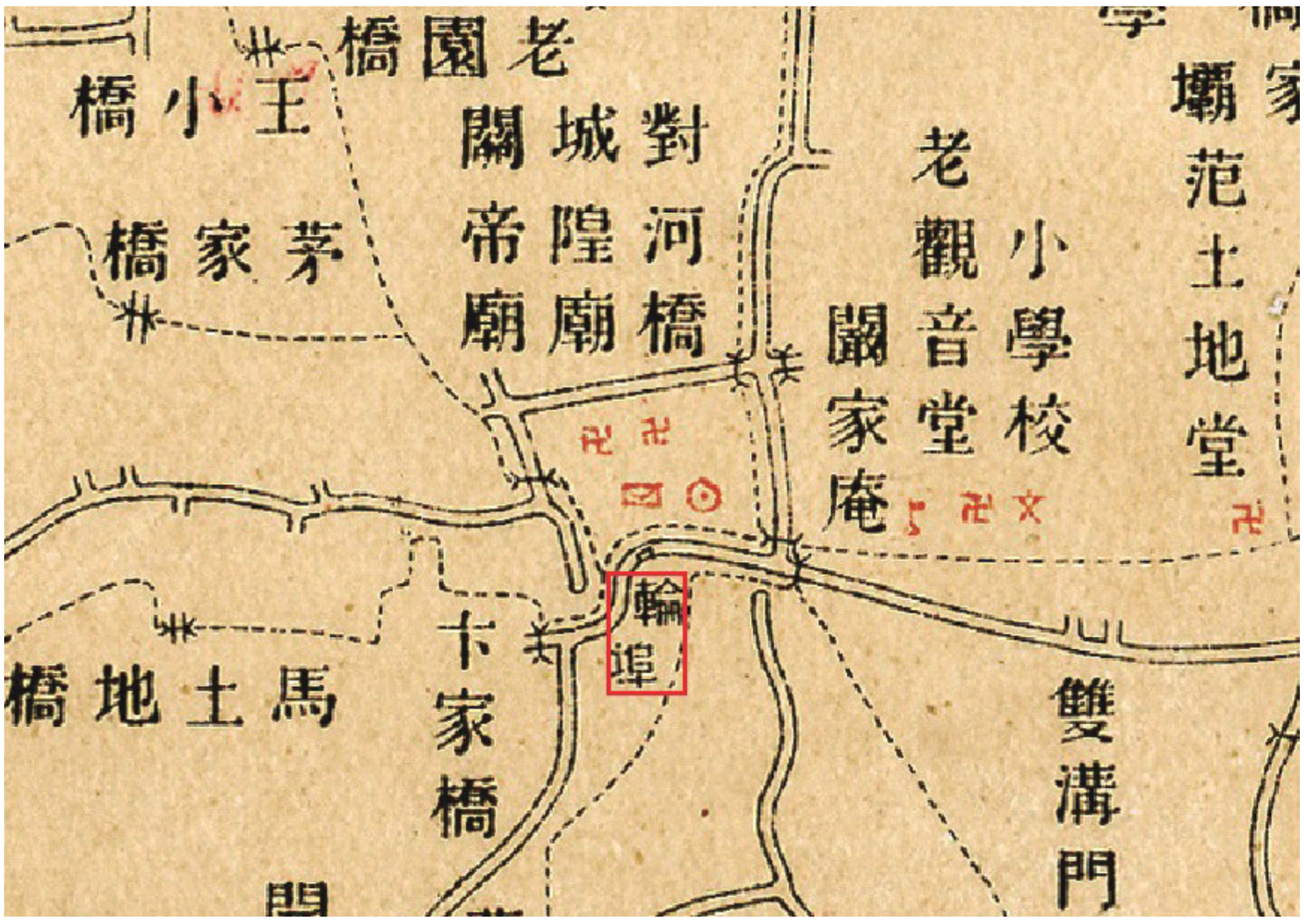
编辑:严晓星 美编:刘玉容 校对:印春湘 组版:曹珺

地名掌故

# 曾经的水运小镇阚家庵

□何美红

1935年地方报纸曾记阚家庵“当交通之要冲,为运输之孔道,轮帆相望,舟车络绎”,自1970年起,阚家庵往来客轮停运,途经该镇的这条河道失去其原有重要地位。曾经的水运小镇由此日趋暗淡,走向衰落。




宣统《通州水陆道里详图》上的阚庵轮埠

小镇阚家庵(亦称阚庵、庵上),因庵而生,因河而兴。1925年《南通》报曾记:“本县城厢东北乡之水路交通,计有二线:一自东门外板桥起,东行经八里庙抵阚家庵。一自三里岸桥起,东行经秦灶,以达阚家庵。”可见小镇当年水上交通运输地位之重要。

### 当年货运曾兴盛

史料显示,阚家庵曾属西亭场,流经阚庵老街的河道是古通州境内连接各盐场的串场河(运盐河)之一。旧时,阚家庵是石港、金沙等盐场连接州城及通扬运盐河的必经之处,运盐船只与盐场大使等在此停泊或过往,不难想象小镇及这段河面当年的繁盛景象。

该运盐河因起自通州,止于吕四,又称“通吕运河”。而阚家庵是其咽喉之一:“街南有东西大河一条,西通县城,东至市稍,河流分为东北两道,东通西亭镇,北通四安市、石港镇及如皋县境岔河区、孙家窑等处”。

因史料不足,当年盐运经此的细节已无从查找,但关于民国年间阚家庵与花布运输的记载则俯拾皆是。据《南通市志》记载,陈家酒店(四安)与阚家庵均为重要产地之一。而1916年曾有报道:“四安之市面全赖布业维持,每年出货有十余万元之钜,均由清(江)淮(阴)宝应各船户运销”。1919年,通城小布销场锐减,“小布之营业有每况愈下之势。幸四安、金沙、兴仁各镇之小布均销于淮南一带,今年尚称得手”。另据1918年《通海新报》载,阚家庵当年有益丰、西福源、正大济等布庄,而阚庵一带的农户几乎家家织布,运销畅旺或许是当地布业兴盛的原因之一。

除了淮宝布商来阚庵一带船运土布,收花时节还有各花行的船只停泊于此,并有本地棉花由此运往通城。该河道还沟通了本地与外界的商业联系:酒店北街著名花布庄“冯德源”的棉花就经过这里运往上海;向以贩鸡鸭为业的四安北乡陈二,将家禽用船装送,经此出港,往上海销售;又因本地大量种植棉花,故食米多赖从江南等地购入,并经这里水运到各乡镇米行,以致1935年地方报纸曾记阚家庵“当交通之要冲,为运输之孔道,轮帆相望,舟车络绎”。

### 水上客运名气大

除了货运,更为大众关注的还是往来于此的水上客运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),由张謇创办的大达小轮公司首先开通经阚家庵、西亭等地至吕四的客运航线,阚家庵成为南通内河最早的客运站点之一。在《二十年来之南通》一书收录的大达公司三条航线价目表中,就有两条经过阚庵:一为唐闸到吕四,一为唐闸至掘港,里程表均显示通州至“庵上”为20里。对于东北班,日人奥田隆在其《南通经济》一书中也有介绍:运盐河水路东北班由“唐家闸至通城、庵上、石港”等地,且记有“乘客颇多,营业非常”。另有记载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唐闸、吕四两地经此对开的东班内河小轮,“每届单日,飞燕(船名,后同)与达河,由东而西。双日,飞鹤与达泰,由西而东”。

查清末宣统年间通州地图,在阚家庵标有“轮埠”二字,可见该镇早就设有轮船码头。1916年,就读通师的吴浦云“往庵乘小轮至校”,曾记“至庵,先买票,一百七十文”。1931年,吴“往庵镇,坐黄启宇家候轮船,启宇赠余船票”。可见当时的阚庵轮埠设有售票处。

关于阚庵轮埠,早年营业情况暂不详。但自1953年起,始由西街居民王鉴清(1912—1995)经营管理。据其子、退休教师王益群回忆,上下客码头位于自家门前,大门堂过道便是候船室,备有条凳,而售票处就设在东隔壁的屋内,并悬挂有“阚家庵轮船自办站”木牌,落款为南通航运公司。

谈到阚庵轮船站及小火轮,至今仍能唤起一些老人的记忆。1953年夏,三余初中补习班撤销,其中,倪汉良等24名学生被县府教育科安排到四安插班就读。他们从三余乘船,在阚庵码头登岸后步行到校,如此往返,直到1955年初中毕业。赵恒昌后人赵卫平则清晰地记得:“上世纪五十年代坐小火轮上城,1角7分钱的票,在阚庵西街上船,到北码头上岸。”

### 水运小镇故事多

阚家庵当年所连接的三条航道,向南的古亭河今仍基本保持原貌,往东与往北的两条虽有填塞或改道,但斑斑古迹,无不凝固着岁月的沧桑。

在当地老人的口述中,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庵东毛炳侯跟着小火轮、沿着河岸搳虎跳儿(方言,即翻筋斗)、竖牛桩子(即倒立),如此一直跟到李观音堂,其身后则尾随着一群看热闹的孩童。而每到这时,汽船上的人或多或少会给他扔点钱。

查阅旧报,早年的旅客也曾见过类似一幕。1919年曾有报道“四安市阚家庵西有贫儿盛泉侯,年十余龄。每日东班、北班大达小轮在往来经过时,该儿在河路飞跑仰面,向轮船舱中搭客乞钱,两手合掌如红孩拜观音状,两足狂奔。舱客怜而掷铜钞于岸,贫儿忙奔拾,后依然奔赶至西亭”。后因趁轮过此的县长瞿鸿宾“见而悯之”,派警讯明后,于当年12月将其“函送河东贫民工厂,请余经理收留学习工艺”。时有评论县长“诚爱民如子之意也”。

早年的阚庵至通城河道曾匪患难除,其中又以阚家庵到瑞芝桥段为最。因“阚家庵以南、李观音堂以北一带之河道,为西亭、四安两区分界之处,各警局鞭长莫及”,以致“阚家庵来往船只屡次被窃”。为此,四安警区于1920年在此设立分驻所。1924年,四安保卫团将“团丁五十名,……分驻要地,实行防卫”,分驻点为“本镇、阚家庵、横港、秦灶、北河边”。1925年又增加阚庵警力,由“原驻巡长1人,警士2人,改设巡长1人,巡警6人,伙夫1人”。

1960年竣工的新通吕运河舍弃了阚家庵、西亭等北路河道,不仅缩短了通吕两地水路距离,底宽也大幅扩展。随着顺直宽畅的新运河的开通,阚庵等处的老通吕运河航运不复繁盛。1970年前后,团结河工程分期施工,老通吕运河阚庵及其西南河道进一步被边缘化。尤其是由于陆路交通的发展,自1970年起,阚家庵往来客轮停运,途经该镇的这条河道失去其原有重要地位。曾经的水运小镇由此日趋暗淡,走向衰落。

老建筑

# 海安宁海路大会堂

□程太和

半个世纪前,海安中楹桥北侧宁海路上有一幢高大的建筑,这就是海安大会堂。大会堂坐东朝西,大门上方有二尺多见方的三个大字——大会堂。

该大会堂建于1954年,建筑面积900余平方米,东西而立,朝西有大门,能容纳八九百人开会。大会堂里放了100多张长条板凳,横向的放了3张,中间一排能坐10个人,两边靠墙的能坐五六个人。两张板凳之间有过道。纵向的大约放了40排。大会堂里面东首用砖块垒高,水泥抹平,开会时是主席台,演出时是戏台。

大会堂刚竣工时,没有任何大会堂的标志,但百姓都习惯称之为“大会堂”。当时海安电影院还未兴建,大会堂就是海安的地标性建筑了。1955年底,时任县长章荣甫看着大会堂大门上方光秃秃的,认为有必要在大门上方请人题写“大会堂”三字,可又找谁来题写这三个字呢?一个偶然的机会,章县长看到紫石公馆有一幅书法作品,这幅作品是心朗法师写赠给韩老省长的,章县长觉得这正是他要寻找的最佳人选。经多方打听,书写者心朗法师原是海安西场石桥观音庙的一个和尚,当时不知何故正羁押在胡集北边的王家楼审查。得知此情,章县长立即派人将心朗和尚提解,带到县人委(当时,县政府称“县人民委员会”),请心朗法师题写“大会堂”三字。人在场,可没有书写大字的斗笔,这又怎么办呢?只见心朗法师沉默了半刻,他说,不要紧,找一根小木棍,再找一个小棉花团来就好了。周围的人都疑惑不解,莫不是这个和尚跟济公一样疯掉了,还敢用棉花团写字?心朗接过棉花团与小木棍,用一根小铅丝将棉花团捆扎在木棍上,然后蘸上浓墨,“大会堂”三个二尺见方的大字就跃然纸上,在场人无不拍手叫绝。心朗何以有这么大的胆识,事后,人们打听到他是早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高材生。心朗是海安曹园人,从上海美专毕业后,先是留校任教,后回离老家不远的西场石桥观音庙接替梅高师傅任主持(心朗年少时从该庙出家)。

1961年8月,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,海安大会堂改名为海安人民剧场,同时将原来的长条凳拆除,改建为长条翻板木座椅,设座位816个。1967年后,逐步发展为开会、演戏、放映三用场所。1980年6月,县里拨出专项资金对“人民剧场”进行翻建,翻建后的剧场总面积为1075平方米,设座位1044个(包括楼座)。1982年8月,海安人民剧场更名为海安影剧场。1989年下半年,影剧场自配发电设备,增加冷气设施。1990年改硬座为软座,同时还在剧场的西北角建了专门的售票厅。1992年影剧场进行观众厅声场改造,投资10余万元引进电影立体声设备,建成县城第二家立体声影院。同年被评为江苏省明星剧场。1995年进行全方位的门面装修并易名为海安大戏院。

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海安县中学上补习班,记得1982年初曾到刚翻建的海安剧场看过彩色故事片《牧马人》。1983年8月暑假期间看过武打功夫片《武当》。参加工作后,在海安影剧场看过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《芙蓉镇》《红高粱》《寒夜》《霹雳舞》等电影。还在影剧场看过南通话剧团演出的话剧《桥头镇特区》(剧本创作者是海安作家夏坚勇)、无锡市锡剧团演出的锡剧《双推磨》。进入新世纪初,全国各地的影剧院都陷入整体低迷,海安也不例外。曾经繁华的海安大会堂(后改称影剧场、大戏院)在转让给慧源书城经营后,现在该区域又改造成海安东大街崇德华府别墅区。

历史人物

# 清廉沙翁零薪水

□白本 余莉

逮元炳任地方学校数年间,承命捐资产几万。有司上其事,得进褒赠。府君顾不怿,谓:“吾所效于乡者,义在则然耳。而乃以市宠乎?”

这段文言引自沙元炳先生为其父沙宝臣撰写的墓志铭。沙元炳(1864—1927),如皋籍实业家、教育家、诗文家、藏书家,清末翰林。沙宝臣(1828—1914),字瀛仙,淡泊名利,嗜好读书,尤熟明清掌故,无意于功名利禄,因子官赠奉政大夫,累晋资政大夫,逝后葬于如皋林梓南原。

回溯家史,沙家于明初移居如皋石庄,初为行伍之家,转为耕读世家,再为官宦世家。清初康熙年间,移居如皋城,世代为官,成为望族,富甲一方。家中富有,沙宝臣乐于奉献,不计报酬,才有上述家传佳话:沙元炳办学捐资数万元,官吏上书,朝廷给予表彰,沙宝臣不以为然,而且心中不喜,反问沙元炳“为乡人服务,本是义不容辞的事,难道是为了博得上司的宠爱吗”?

沙翁(沙元炳)秉承家风,乐于奉献地方教育事业。即便他是诸多学校的校长、董事,他素来清廉,从未产生通过教育为个人谋取私利,相反是满满的奉献。其中有一则感人的事迹。夏骏导演拍摄纪录片《沙元炳》时,友人黄天铨(如皋高等师范学校副教授)接受采访回忆,早些年他编辑如皋高等师范学校校史及搜寻相关材料申报文保单位,意外发现一份原始档案。从档案中,他清清楚楚地看到沙翁在学校的薪金记录为“0”。沙翁作为学校校长,竟然一分不要。起初,他办学捐资,后又为学校图书馆捐书,竟然不领薪水,怎能不令人感动。也许有人会说,他家有钱,无须薪水。其实如皋那时也有其他富人,但是能像沙翁一样的,真是寥寥无几。

遗憾的是,纪录片《沙元炳》未能将那份相关档案拍入其中。据说源自如皋高等师范学校与南通师范合并,旧有档案、书籍全部移去南通,黄天铨副教授已无法寻觅当年所见原始档案。幸运的是,笔者从一份印于清末民初的书刊中,获得相关沙翁记载,读来更令人感动:

自开办高等小学及推广初级师范学堂以来,学界公推监督,经营五年,不支薪水,犹复倡捐巨款。通如合办中学,又倡捐二千元。

所谓“高等小学”就是如皋公立高等小学堂,即今如皋师范附属小学的前身;“初级师范学堂”正是如皋高等师范学校的前身。从这段话记载来看,两所名校经沙翁捐资创办后,沙翁又被推举为两所名校当仁不让的管理者。关键是连续五年,沙翁未从两校账上领取一分钱薪水。相反,他又带头募捐2000元,协助张謇先生创办通海五属公立中学(南通中学的前身)。

从清末京城为官到民初出任江苏省议会议长,沙翁未有任何贪污流言。成为诸多学校创办人、董事,他又只谈付出,不谈索取,可谓清廉为官,奉献为师。

史海回眸

# 贴在成长岁月里的年画

□羌松延

第一次遇到除夕不放假,但老父亲还是早就发来微信:“三十夜子上午早点到家长对啊。”一句话,将我的记忆带回到过去的时光。

长,音掌,敬辞。南通人的常用词有长香、长烛、长灯、长对等,即点燃香烛、灯具及张贴春联年画之意。“有钱没钱,买画儿过年”。回想童年时代,人们的日子过得都不宽裕,但每到腊月时节,家家户户总要买几张年画贴上,给新年增添喜气。买年画、贴年画、赏年画成了我儿时的一大乐趣。

糕馒蒸好,被褥洗完,檐尘掸过,童年期盼的新年脚步也就越来越近了。简单置办的年货里除了吃的、穿的,孩童最关心的莫过于买画儿过年了。

记得当年的农村,只有供销社才卖年画。跟着大人,踏过长长的石条台阶,进门就能望见已经编号的年画样品,悬挂成排,供人挑选。那时的年画,虽构图简单但主题突出,如《五谷丰登》中,俩农民头扎毛巾、簇拥着一大筐黄灿灿的稻谷和麦穗,笑逐颜开;《生命不息,冲锋不止》里,珍宝岛之战的英雄于庆阳手持钢枪、头裹纱布,一人冲锋在前;还有历史气息和政治意味浓厚的《毛主席去安源》《一定要解放台湾》等。至于《红色娘子军》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等样板戏剧照,更是年画的主题……

挤在人群里的我,踮起脚跟,仰着颈项,一张张扫描过去,因为“预算”实在紧张,选了这幅,舍不得那幅,让恨不得买下所有年画的我最后只能忍痛割爱。在那一片灰暗的岁月里,低矮、破旧的草房有了色彩鲜艳的年画映衬,立马就变得满屋生辉,年的味道也被渲染得醇厚香甜。

上中学后,父母开始让我独自去买画。菜市场旁边和老街小商店门外的年画摊也一年比一年多。为了能多买几张自己喜爱的年画,我很早就开始积攒“资金”:夏天刮癞蛤蟆浆、捡蝉蜕卖到药店;秋天扛着芦穄到菜市场、背着栗树果到供销社;如果还不放心,到了买画儿那天,就找出破布、牙膏壳卖到废品收购站,再兴冲冲飞奔到年画摊。

等到大年三十上午(按照风俗,要在中午祭祖之前贴好对联、年画),父亲就领着我喜气洋洋地长对贴画了。乡下贴年画有很多讲究:裁年画不作兴动刀动剪,用的黑线称之为青棉线(音);贴年画用的糨糊喊作“粘(音年)头”;而对联、年画的白边叫“长(音掌)头”;至于用来登高长对的梯子,则惯以“步步高”之名取代……总之,一切都要赋予吉祥、美好的寓意。年画多由父亲张贴,我配合着递这送那,并站在不同位置指挥校正。因为失误,有一次待贴好后才发现稍有歪斜,就在我要自责的时候,父亲一句“好!仄(南通方言,音同辄,意倾斜)是发财!”一下子化解了我的尴尬。

多少年后,贴年画的换成了我,指挥校正的换成了父亲。唯一不变的是,当年画没有贴正时,父亲还是那句:“好!仄是发财!”

随着时代的进步,年画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,以风景、花卉、香车、美女、明星为题材的各色年画大量出现,深受年轻人的喜爱。记得有一年,祖父早早请回了一套门神,我打开一看,全是花花绿绿的大色块:有体态臃肿的《大加官》、面目狰狞的《秦叔宝尉迟恭》、头大身短的《麒麟送子》……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古板、粗糙,怎么也喜欢不起来。老人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,便告诉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,是本地艺人手工制作的,吉利又灵验。我半信半疑,不好意思再说什么。等到第二年,我提早购买了印刷的年画,祖父也没吱声,家中从此就远离了那些老门神。

如果要说年画的内容变化,最明显的要数中堂画了。记忆中的那个“革命”年代,领袖像(标准像或招手像)曾走进千家万户,一直占据着堂屋墙壁的正中位置;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,农户的堂屋又逐渐被以寿星、观音、财神或福禄寿为主题的中堂画所替代;如今,走进一幢幢农家洋楼,中堂的位置基本上都换上了国画原作,或富贵牡丹,或山水风光,有的还出自名家之手,再配上精美的原木画框,除了体现主人的品位与修养,更彰显出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之丰富与精神世界之充盈。

岁月不居,光阴荏苒。时间在一年年买年画、贴年画、赏年画的期盼与喜庆气氛中流过,不知不觉间,我也成了自己童年时代眼中看似遥远的“年过半百的老人”。如今,每到春节前夕,每当在大街小巷见到年画店铺,就会立刻涌起儿时贴年画、瞟过年时的那份激动、充满期盼的心情。

年画,永远是年的标志,是我割舍不断的情愫。

## 征 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老建筑、历史人物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